

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地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证据

高玲玲 孙海鸣

【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区域调整非常频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是其重要动机。本文整理了全国1992~2012年间2245次地市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1992~2012年整个时间段内全国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正效应，东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1~2012年间表现为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在1992~2000年间表现为负面效应。可见行政区划调整并不总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区域一定的时期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换言之，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效应因时因地而异，这对我国目前方兴未艾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行政区划调整；区域经济增长；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15）—05—0066（06）

【作者】高玲玲，讲师，博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孙海鸣，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335

一、问题提出

2011年安徽省政府宣布“三分巢湖”，从而使得省会合肥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特大城市，这一次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重振省会合肥，做大合肥经济圈。而在此之前一次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当属1997年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设立直辖市，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那么这些行政区划调整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到底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呢？

关于行政区域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较少，

主要是由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譬如在美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极大，很小的调整就往往会导致政府间关系极大变化。所以一般仅出于控制疾病传染、保护生态等目的才调整行政区域，而很少出于经济发展目的进行调整（Wagenaar, 2004）。^[1]但国外相关文献（尤其是部分政治经济学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如Alesina和Spolaore（1997），Alesina等（2000）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面积与数量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效果。他们认为，较大的国家面积一方面拓展了国家内部市场范围，从而更加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观念冲突和公共品的需求差异引发社会矛盾。^[2-3] Redding和Sturm

*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AHSK11-12D2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国际分工、增长偏好与“结构差异事实”——基于开放经济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2013HGXJ0261）；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CXJJ-2012-362）。

(2008) 以东西德分裂和重新合并为例阐明了市场准入限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4]

我国是处在转型期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步伐，带来“行政区”效应，行政区划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刘君德等，1996）。^[5]国内学者就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针对性较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如下3个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案例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影响。陈钊（2006）以四川省1993到1998年为例研究了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对比相关地区在拆分前后占全省GDP比重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且新设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更为强劲。^[6]王贤彬、聂海峰（2010）利用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独立出来设立直辖市这一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次自然实验，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7]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第二，以地区为例阐述行政区划调整对某个经济方面（如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的影响。陈忠祥、李莉（2005）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研究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对银川、吴忠、青铜峡和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8]白小虎（2008）通过对杭州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空间变迁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证研究，说明现阶段行政区划调整的可能路径及其对产业空间变迁和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9]林耿直、柯亚文（2008）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10]

第三，比较系统地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模式、作用和改革思路。王健等（2004）提出了“复合行政”的新理念，强调要跳出行政区划调整的传统思路，加快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转向治理。^[11]周伟林等（2007）以1983~2005年长江三角洲37个城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对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内容及模式进行分类归纳，并仔细探究了各类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原因。^[12]张小明、刘慧灵（2009）基于复合行政、区域管治、联合治理等理论基础，结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实证分析，探讨如何通过地方政府间机构、制度、政策、利益等方面的合理安排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最终建构起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的区域行政区划体制。^[13]

上述研究对深入理解行政区划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理论上未能揭示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大部分研究只是简单的分析其历史和现状，缺乏对作用机制的深入认识，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必然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其二，实证研究方法存在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对比区划调整前后的效应时，单纯地应用GDP比重或者主成分进行对比分析，而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本身就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拟从上述两个方面突破，深刻剖析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机制，同时利用“双重差分法”对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经济发展的效果进行详尽的实证研究。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域划分的调整非常频繁。图1和图2分别统计了中国1978~2012年这35年间的区县级和地市级行政区划调整情况。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相对较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有两次调整高峰，而2003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相对较少。2000年以前中国对于撤县设市以及县、市升格的调整力度较大，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数量增加最为迅速的几年。近10年间，我国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逐渐由“市”转向“区”，这一转变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已慢慢由“量变”转为“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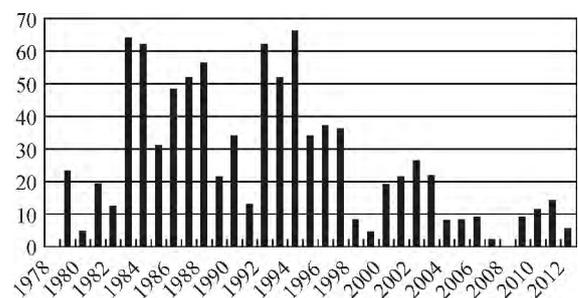


图1 1978~2012年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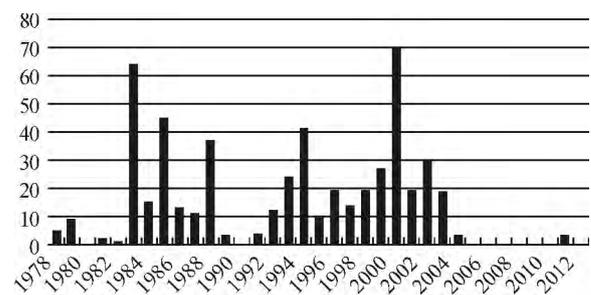


图2 1978~2012年地级行政区划调整次数

分地区看,中国东部地区各省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变动频繁,以区县级的调整为主,地市级的变动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整次数逐渐减少,2000年之后东部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行政区划调整,其中地市级的调整次数为0。在统计过程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调整类型以撤县设市、地市升格为主,而近10年的调整类型大都为撤(县)市设区。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同,改革开放初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率较高,近几年调整不多,且大都集中在区县级调整。从调整次数上来看,中部地区的区县级调整明显少于东部地区,但其地市级调整却比东部地区多。西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次数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很多省份几乎没有进行调整,区县级调整与地市级调整次数相差不多。不同于其他两个地区的是,改革开放至今,西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次数分布比较均匀,90年代前后没有明显变化。

三、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行政区域规划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这种面向经济发展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行政区域调整一般分为拆分、合并、升格以及县市设区等几个方面,这些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效应可以整合为强化中心城市功能、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3类。

1. 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中心城市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龙头作用、极化聚集作用、扩散辐射作用以及创新示范作用等4个方面。而将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行政区拆分,正是由于原有行政区域的中心城市相对较小,不能有效的发挥中心城市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拆分,可以培育新的区域经济中心,通过极化聚集而形成新的中心城市,进而加强中心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带动新设的行政区域经济增长。而对于原有被保留下来的行政区域来讲,由于其面积减少,原本的中心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也显得更加有效,从而促进老行政区的经济发展。

2.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从而使得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而合并行政区划这种上级政府行为则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打破这种区域间的壁垒,从而更好地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

除了人才、资金等流动要素外,土地这种非流动要素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面积较小的行政区域而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原有区域的土地供给无法满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通过合并行政区划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如2011年的安徽“三分巢湖”的行政区划就是通过将原有的巢湖市拆分开合并给合肥、马鞍山以及芜湖3个城市,从而满足以上3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

3. 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行政区经济”可以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地方政府更大程度上享受着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如更多的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创造地方政府间的比较优势,进而实现地区和政府间的竞争。行政区域升格以及县市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更好的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展“行政区经济”。

四、实证分析

1. 模型

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对比调整前后的经济绩效。但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且各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大不相同,很可能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变化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所以若直接进行对比可能会产生偏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而言,本文构造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处理组和没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比较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从而检验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把样本划分为4组:调整前的对照组、调整后的对照组、调整前的处理组和调整后的处理组。设置两个虚拟变量来度量这种样本划分:一个是处理组取值1,对照组取值0;另一个是调整前取值0,调整后取值1。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du_{it} + \beta_2 dt_{it} + \beta_3 du_{it} \times dt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Y 表示经济增长速度, ε 为扰动项。

在对照组, $du_{it} = 0$,由式(1)可知,调整前后的经济增长分别为:

$$Y_{it} = \begin{cases} \beta_0 + \varepsilon_{it} & \text{调整前, } dt_{it} = 0 \\ \beta_0 + \beta_2 + \varepsilon_{it} & \text{调整后, } dt_{it} = 1 \end{cases}$$

可见,在行政区划调整前后,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的变动为 β_2 。同样地,由式(1)可知,处理组调整前后的经济增长为:

$$Y_{it} = \begin{cases} \beta_0 + \beta_1 + \varepsilon_{it} & \text{调整前, } dt_{it} = 0 \\ \beta_0 + \beta_1 + \beta_2 + \beta_3 + \varepsilon_{it} & \text{调整后, } dt_{it} = 1 \end{cases}$$

可见,在行政区划调整前后,处理组的经济增长的变动为 $\beta_2 + \beta_3$ 。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对调整区域的经济“净影响”为 $(\beta_2 + \beta_3) - \beta_2 = \beta_3$,即交叉项 $du_{it} \times dt_{it}$ 的系数。当理论假说成立时, β_3 显著为正。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参照徐现祥等(2007)的做法,^[14]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Y_{it} = \beta_0 + \beta_1 du_{it} + \beta_2 dt_{it} + \beta_3 du_{it} \times dt_{it} + \beta_4 \log y_{i,t-1} + \beta_5 \log inv_{it} + \beta_6 \log(n_{it} + \gamma_{it} + \delt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y_{i,t-1}$ 为每期期初的实际人均GDP, inv_{it} 为投资率, n_{it} 、 γ_{it} 、 δ_{it} 分别为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

2. 数据

本文搜集整理了1978~2012年各省的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调整次数,按行政级别划分为区县级和地市级两类。因本文探索的是行政区划调整对省域经济的影响,区县级调整范围较小,对整个省域经济的影响也较低,故在实证分析中,只采用地市级行政区划调整来进行分析,以下所述的行政区划调整均为地市级调整。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由于某些省份数据不全,且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区划调整相对混乱,为保证实证分析的有效性,本文结合我国发展实际,选取1992~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直辖市特殊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去掉了北京、天津和上海,同时由于重庆1997年成立直辖市,为了保持数据的连贯性,本文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此外,人口增长率、投资率等数据均由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由上述模型介绍可知,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的影响,必须根据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情况,对 du_{it} 、 dt_{it} 进行赋值。首先,考察 dt_{it} 的赋值:对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的省份 i 而言, dt_{it} 表示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前,记为时期1; $dt_{it} = 1$ 表示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后,记为时期2。其中,时期1为1992年到该省第一次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那一年 t_1 ,时期2为 t_1 下一年到2012年。其次,考察 du_{it} 的赋值:本文将1992~2012年间从未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5个省份——东部的海南和辽宁以及西部地区的青海、新疆和西藏作为对照组, $du_{it} = 0$,其余省份作为处理组, $du_{it} = 1$ 。最后,考察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匹配:当对某个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省份 i 进行

上述规则赋值 dt_{it} 后,海南等对照组也按相应的规则赋值 dt_{it} ,同时计算关心的其他变量。

3. 估计结果

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具有较强的时期特征。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必要将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分时段研究。就1992~2012年之间,一般将其划分为1992~2000年,2001至现在两个时间段——前者是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后者是市场取向改革制度逐步完善阶段(汪海波,2008)。^[15]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估计,表1列出了1992~2012年、1992~2000年、2001~2012年3个时段的实证结果。

表1 1992~2008年全国范围行政区划调整效应

| 时段 | 1992~2012 | 1992~2000 | 2001~2012 |
|----------------|-------------------|-----------------|-------------------|
| 常数 | -0.266***(-5.93) | 0.066(0.74) | -0.240***(-4.36) |
| du | 0.048*** (5.22) | 0.035*** (3.65) | -0.054*** (-2.96) |
| dt | 0.001(0.1) | -0.009(-1.47) | 0.015(0.84) |
| du × dt | 0.021** (2.2) | -0.0114(-1.28) | 0.080*** (4.34) |
| log y | 0.033*** (12.67) | 0.013* (1.89) | 0.019*** (7.52) |
| log inv | 0.069*** (14.31) | 0.016(1.42) | 0.078*** (20.39) |
| log(n + γ + δ) | -0.050*** (-2.96) | 0.040(1.26) | -0.097*** (-4.5) |
| R ² | 0.11 | 0.10 | 0.27 |
| 对照组 | 5 | 5 | 5 |
| 样本量 | 2245 | 1188 | 1057 |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10%的显著性检验。

由前述分析可知,本文关心的是 $du \times dt$ 的系数即 β_3 的值,若其值显著且为正,则说明该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其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由表2可以看出,对全国范围而言,1992~2000年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微弱, β_3 值为-0.014且极不显著。2001~2012年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有较强的正面影响,系数 β_3 为0.0780,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1992~2012年整个时间段内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正效应,我们关心的系数 β_3 值为0.021,且在5%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时段存在明显差异。在1992~2000年这段时期,该作用并不明显,但2001~2012年期间该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

为了进一步看清不同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将全国划分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单独进行分析。按照上面同样的思路,将整体研究时期1992~2012年划

分为 1992 ~ 2000 年, 2001 ~ 2012 年两个时段。表 2 是回归结果:

表 2 1992 ~ 2008 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行政区划调整效应

| 时段 | 东部 | | | 中西部 | | |
|-----------------|----------------------|----------------------|-------------|----------------------|---------------------|----------------------|
| | 1992 ~ 2012 | 1992 ~ 2000 | 2001 ~ 2012 | 1992 ~ 2012 | 1992 ~ 2000 | 2001 ~ 2012 |
| 常数 | 0.001 (0.01) | 2.236*** (9.18) | - | -0.284*** (-5.58) | -0.018 (-0.12) | -0.118 (-1.59) |
| du | 0.046** (2.21) | -0.001 (-0.02) | - | 0.064*** (7.13) | 0.047*** (4.81) | -0.058** (-2.09) |
| dt | -0.032*** (-2.76) | -0.034*** (-2.95) | - | 0.032*** (7.35) | 0.025*** (5.16) | 0.011 (0.39) |
| du × dt | -0.029 (-1.37) | 0.092*** (3.88) | - | -0.032*** (-3.54) | -0.029*** (-2.7) | 0.092*** (3.35) |
| log y | 0.011 (1.58) | -0.249*** (-9.35) | - | 0.035*** (9.6) | 0.024*** (2.65) | 0.010** (2.16) |
| log inv | 0.098*** (6.79) | -0.167*** (-5.67) | - | 0.062*** (8.18) | -0.004 (-0.33) | 0.088*** (8.85) |
| log (n + γ + δ) | -0.046 (-1.38) | 0.040 (1.19) | - | -0.036** (-1.97) | 0.065 (1.24) | -0.081*** (-3.47) |
| R ² | 0.09 | 0.22 | - | 0.3 | 0.09 | 0.19 |
| 对照组 | 2 | 2 | - | 3 | 3 | 3 |
| 样本量 | 850 | 450 | - | 1395 | 738 | 657 |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 2 列出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 1992 ~ 2000 年间非常明显, β_3 值为 0.0924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由于 2001 ~ 2012 年间东部地区没有发生过地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 所以无法识别 β_3 的值。整体区间 1992 ~ 2012 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因此变得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而言, 1992 ~ 2000 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效应, β_3 值为 -0.029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2001 ~ 2012 年间, 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 β_3 值为 0.09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整体区间 1992 ~ 2012 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为小却显著的负面效应, β_3 值为 -0.03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说明, 不但不同时段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 不同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 行政区划调整确实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该影响效果因时因地不同。全国范围数据表明研究区间的前半段时期 (1992 ~ 2000 年)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后半段时期 (2001 ~ 2012 年)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面促进作用, 整个时间段 (1992 ~ 2012 年) 行政区划调整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为微弱的促进效应。分地区看, 应该说东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但中西部地区在前半段时期 (1992 ~ 2000 年) 呈现出显著的负面效应, 在后半段时期 (2001 ~ 2012 年) 呈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在市场取向改革初期落后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并未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没有通过区划调整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 反而由于区域整合不力, 居民缺乏认同感而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笔者还通过改变部分控制变量、调整对照组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化后的结果并未对回归分析结论带来实质性影响 (限于篇幅, 本文没有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

中国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域调整非常频繁,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是其重要动机。本文从强化中心城市功能、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3 个方面考察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并利用全国 1992 ~ 2012 年间地市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对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在 1992 ~ 2012 年整个时间段内, 全国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正效应。按照惯常做法将此时间段划分为 1992 ~ 2000 年和 2001 ~ 2012 年两个时间段后, 虽然 1992 ~ 2000 年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微弱, 但 2001 ~ 2012 年期间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有较强的正面影响, 这说明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时而异。将全国地域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发现东部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非常明显, 中西部地区在 1992 ~ 2000 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效应, 2001 ~ 2012 年间则表现为显著的正面效应, 这说明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地而异。

上述发现揭示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时因地而异, 并非总是正面的。其中的原因在于行政区划调整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其成本在于行政区划调整打破原有均衡之后, 需要重新整合当地经济、政治、社会资源, 协调各方经济利益, 平衡各方实力, 甚至还要考虑到其他地区的外部效应问题。同时, 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个涉及行政、财税体制以及人事体制等全方位动态系统演进过程, 这需从上到下各部门通力合作, 仅仅是表面的调整而无内部实质性的整合是不会取得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行政区划调整不是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 落后地区对此当有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Wagenaar, D. A. and C. Adami. Influence of Chance, History, and Adaptation on Digital Evolution [J]. *Artificial Life*, 2004, (02): 66-87.
- [2]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04): 1027-1056.
- [3] Alesina, Alberto, Enrico Spolaore and Romain Wacziarg.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12): 176-197.
- [4] Redding, Stephen J. and Daniel M. Sturm. The Costs of Remoteness: Evidence from German Division and Reunifi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05): 1766-1797.
- [5] 刘君德, 舒庆. 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行政区划经济 [J]. *改革与战略*, 1996, (05): 1-4.
- [6] 陈钊. 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6, (03): 418-421.
- [7] 王贤彬, 聂海峰. 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 [J]. *管理世界*, 2010, (04): 42-53.
- [8] 陈忠祥, 李莉. 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研究——以宁夏中北部城市群为例 [J]. *人文地理*, 2005, (05): 51-55.
- [9] 白小虎.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产业空间变迁——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8, (09): 65-73.
- [10] 林耿直, 柯亚文.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04): 50-56.
- [11] 王建等. “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 (03): 44-48.
- [12] 周伟林等.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7, (05): 82-91.
- [13] 张小明, 刘慧灵.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例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6): 36-43.
- [14] 徐现祥.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07, (09): 18-31.
- [15] 汪海波.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 [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8.

How Does Adjus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Affect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t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bove

GAO Ling-ling^{1 2} SUN Hai-ming^{1 3}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3.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335, China)

Abstract: China adjustment its administrative areas frequently since reformation and openness in 1978, whose important motivation lies in accelerat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empiricall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2 to 2008, and finds that adjus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accelera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eakly from 1992 to 2008 in countrywide, but accelera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in the east. However, it held up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1992 to 2000 and accelera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from 2000 to 2008 in the mid-west. So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reas is not always facilitat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t maybe even holding up economic growth in certain areas and periods.

Key Words: adjus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责任编辑: 王丽娟